

第三篇 调西藏

1959年3月西藏以达赖为首的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反革命叛乱，在党的领导下，决定对西藏实行平叛改革。我与爱人程明敏一起被调西藏，支援西藏平叛改革。

- 一、进藏前让我们回老家探亲半个月
- 二、四川省委组织部给我们送行
- 三、西藏兰州办事处招待所遇到的“怪事”
- 四、“慕公馆”的故事
- 五、躺在车厢里拉到了拉萨

一、进藏前让我们回老家探亲半个月

四川省委组织部鉴于我们入川工作已 10 年未回老家探过亲，加之当时西藏不准带小孩进藏，特批我们半个月假期，回老家探亲和安顿小孩。接通知，我们当天晚上就从成都出发，赶回南京、合肥，探视了双方老人和亲人，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了老程的母亲。匆匆忙忙回到成都，投入行前的准备工作。

成都人民北路有个西藏招待所，那里设有援藏干部接待站。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简单的介绍了西藏形势，交待了进藏走法。要我们抓紧进藏，先到兰州西藏办事处，开具沿途各种证明。

当时规定进藏补助费，每人 40 元和一丈二尺布票，还预支了路费和一个月的工资，这些事不到半天就办完了。40 元进藏补助费确实不算多，还不到我当月工资的一半。不过我们那时也没有什么想法，给多少就拿多少。

1960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市场商品奇缺，都需要票证，用发的二丈四尺布票给老程做了件棉大衣，我只好咬咬牙花200元在旧货摊上高价买了一件狐皮统子，没有钱和布票做成大衣了，我把皮统子穿在风衣里，腰间扎一扎，倒也管用。

二、四川省委组织部给我们送行

临行前，省委组织部请我们观看了一场名旦陈书舫演的川剧辞行。组织部长找我谈话时送了一本尚未公开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按规定公安厅还给我配了一支自卫手枪。

三、西藏兰州办事处招待所遇到的“怪事”

我们的第一站先到兰州，需要在那里办理进藏的一切具体手续。因为此后每个需经过停留的站，都是西藏设立的，要带上一个一个介绍信，否则吃、住、行都无法解决。

从成都到兰州，没有直达的火车，要在陕

西省宝鸡市转车，那时正在动员城市人口到农村安家落户，南来北往的人特别多。宝鸡正处于东西南北的交汇口，火车站上滞留了大量旅客，大都是拖儿带女全家搬迁。地上放着一堆堆的行李，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拥挤不堪。我们幸好行李是托运的，单身两人，没有耽搁就挤上车，顺利地到达兰州。

这里想特别提一下在兰州招待所住宿时遇到的“怪事”。住在我们隔壁的是一对刚从西藏出来的年轻夫妇，每天晚上打小孩，而且打得很厉害，一直要打到小孩哭不动睡了才歇。在小孩伤心的哭叫声中，有时还伴有小孩妈妈的低泣声。当时，我很纳闷，心想这当妈妈的能这样狠心地打小孩吗？究竟为什么？因为不熟悉，又不便过问。后来还是老进藏的同志给我们解了这个“谜”。他告诉我们，至今去西藏的同志，是不允许带小孩和老人的，这不仅是因为社会、气候等不适应因素，还有一很重要

的原因，是供给十分困难。按当时车况、路况都不好的情况下估计，每进 20 个职工，他们的吃用就得一辆解放牌汽车常年运输供应。汽车本身所消耗的汽油，也是用汽车运进去的。为解决少部分职工小孩无亲属可托的实际情况，在兰州、成都、西安等办事处驻地，都办了全托的幼儿园。有的一、二岁，有的甚至几个月就送进去全托了。他们的父母特别是在西藏远离拉萨县区工作的，一走要好几年，才能出来相见，时间长了，小孩以园为家，把老师、阿姨当妈妈，一旦见到自己的母亲也不认识了，不肯叫妈妈。有的小孩哄一哄，给点好吃的好玩的就亲热了，有的不服这一套，就是不肯叫爸爸妈妈。遇到这种情况，父母有气就打，往往越打越僵，孩子戒备对抗心理就越大。他说：“你们隔壁的一对夫妇，就是小孩一岁寄放在这里托儿所的，这一去就是四、五个年头，小孩当然就不认识自己的爸爸妈妈。”这种情

况，谁遇到都会辛酸，而这情况只有早进藏的西藏干部才会有，也只有他们才会真正体会到这种内心深处的辛酸和苦辣。

从兰州出发，我们乘火车西行，到兰新铁路的峡东车站，到那里便结束火车行程了。峡东站在甘肃省的尽西头，是个很小很小的站，完全是为进藏转运人、物建立的。这个站在我们走后不久就西移到柳园，所以一般地图上都找不到它。

在峡东，我们转乘专为进藏职工服务的大客车。下一站是青海格尔木。

汽车开出峡东，奔驰在辽阔的柴达木草原上，途中经过艺术宝库敦煌和神话般的盐湖。那时的敦煌，远没有现在这样家喻户晓、驰名中外的知名度，我们的车子为了赶路，只是与它擦肩而过，未能目睹，深感遗憾。汽车走在盐湖上时，大家感到特别新奇，因为一眼望去，地面上都是白花花的盐，连公路也是盐块凝成

的。“柴达木”蒙语是盐泽的意思，难怪这方圆20万平方公里的大盆地，要以盐而取名。

路上住了两个晚上，就到了青海省的格尔木。

四、“慕公馆”的故事

格尔木办事处的同志，把我们安顿在一个人称“慕公馆”的小招待所住宿。后来从熟人那里，才知道这幢小楼房为什么被人称作“慕公馆”来历。因为它是当年为指挥修筑青藏公路的慕生忠将军修建的，现在慕将军筑路完成走了，便把它作为接待西藏干部的招待所，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慕公馆”。“慕公馆”是一个不大的小院子，里面有几间平房和一幢二层的小楼，小巧实用，结构比较紧凑。如果在内地，像这样的小院是很一般的，但建在周围都是简陋平房、帐篷的格尔木，它就显得很突出。

我们接到办事处转告的通知，叫我们在这里等西藏工委派出的车，接我们去拉萨。

住在“慕公馆”等车的日子里，听到不少关于慕将军的奇闻。

格尔木原是一片荒漠，是野羊野马出没的地方。为了进军西藏和修筑青藏公路的需要，把这里作为一个据点逐步建立起来的。当时负责筑路的是为西北进藏部队运送粮食物资的西藏运输总队负责人、兰州军区的一位将军，叫慕生忠。他和他的部队，以及从甘肃、宁夏、青海招的驼工和民工千余人，一面运输一面修筑青藏公路。

慕将军和战士一样，赶着马群和骆驼，奔波在昆仑山的荒山野地里，日夜忙着运输粮食物资，带领民工为汽车开道、排除障碍。他筑路的铁锹柄上刻有“慕生忠之墓”5个字。他告诉战友们：“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头一定要朝着拉萨的方向”。慕将军正是凭着这股坚定的信念、拼搏的精神，终于战胜一切天险，

完成了这条通往拉萨的天路。这条天路，实实在在是当年慕将军的运输总队，赶着驼粮的骆驼马队，一步一步艰难地踩出来的，是战士、民工用血汗洒出来的。后来我们沿着青藏公路在昆仑山、唐古拉山走时，看到两旁无以计数的木碑小坟堆，从心底里崇敬这些筑路英雄、崇敬这些为筑路献出生命的战士、民工。

关于慕将军的故事很多，其中有一则传说神奇而有趣。那时的格尔木，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战士和男民工，为了要使他们安心筑路和工作，慕将军想出一个“良计”，他说：“这里应该有一座城市！”号召部队和民工接家属来格尔木定居。甚至下命令，要共产党员带头把家属接来，没有结婚的，回去找一个老婆带来。他把女人和城市联系起来。慕将军胆识超人，懂得女人与家庭的关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有了女人，就有了城市。格尔木的第一代开拓者中，不少人在这里扎下了根，安居乐业，繁

衍生息。几十年后，今天的格尔木，已荣升为市，是青海省西部的最繁华的城市，除南来北往的汽车在这里路过外，还有火车直达省会西宁。当年慕将军心中的城市，不是已经冉冉升起，矗立在这块土地上了吗！

很多年以后，慕将军去世了，听说按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撒在昆仑山上。格尔木的人们怀念他，敬仰他，称他是“青藏公路之父”。

五、躺在车厢里拉到了拉萨

要搭乘去拉萨的车终于到了。车子是西藏工委车队派来的，开车的司机叫刘英。他是送自治区一位领导去北京开会，送他到峡东车站上火车，组织上交待他回来时，接我们和一位从陕西调进藏的同志到拉萨。那位陕西来的同志，正好赶到峡东搭上他的车子。

刘师傅是四川人，典型的四川个头，很结实。他是解放初当运输兵进藏的，转业后留在工委，是个开车老兵，很有经验。刘师傅一到

格尔木就来找我们，对我们说，你们再休息一天，我抓紧把车子检修一下，后天就出发。

休息一天后，我们坐上刘师傅的车向拉萨出发了。刘师傅开的是后厢对面对有两排座位的吉普 68 车，在那时吉普 69 和这种车，是跑高原长途最合适的车。那位陕西来的同志，比我们长十几岁，有四十多岁，那时这个年龄进藏算年老的了。我们称他“老同志”，他坐在车子前座。

车子开出格尔木，平稳地向着一望无际的荒漠上奔驰。我们贪婪地观赏着车外这高原特有的景色，自我感觉还挺不错。看刘师傅，他一面悠悠自在的开车，一面嘴里不时哼哼的唱着。他会唱的歌真不少，一会儿是“呀拉索，呀拉索……”西藏民歌，一会又唱：“太阳下山落儿喜洋洋……”四川民歌，更多的还是唱“二呀二郎山呀高呀高万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告诉我们边开车边唱歌，是在部队开车时养成的习惯，因为不抽烟，嘴里哼哼

就不瞌睡了。

车子整整跑了半天，到了格尔木出来的第一个部队接待站——纳赤台兵站。

“兵站”，没有走过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的人，是不会了解兵站是做什么的。它是筑路部队完成筑路任务以后，按路程距离分段设置的部队接待站，属于部队建制。这种设置只有青藏、川藏公路才有。它的任务，主要是接待过往车队和人员的食宿和汽车加油，另外还要负责保卫公路的安全畅通，重要的路口要地，还有部队驻守。一般的兵站都有食堂、住宿的床铺，加油的油罐。住的条件很差，都是一些统铺。吃的也都是从内地运去的，主食以馒头为主，菜以粉丝、木耳、黄花菜等干菜为主，蔬菜便很稀少了，往往不是冻过的便是脱水干菜。大一点的兵站，还配有医务人员。当时地方上过往的车辆和人员也是由部队兵站接待。

我们在这里吃了午饭后继续进发，目标是“五道梁”兵站，那里的兵站大一些，是进藏

必须住宿的地方，否则再往前就赶不上另一个可以住宿的站。在青藏路上什么地方吃饭，什么地方住宿，都必须计划好，否则，“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了。

下午开始，因为海拔慢慢升高，我开始感觉头痛了。而且越往前走越感到不舒服。看老同志的样子，比我还难受，老程倒还无事。这时司机告诉我们已经过了昆仑山口了，你们不舒服是高山缺氧的反映，不要紧，到了目的地睡一觉就好了。

天将黑的时候，我们赶到了目的地——五道梁兵站。刘师傅给我们登记了住宿。站长是一个多年的老兵，他热情的接待了我们，把我们安排在一个比较小一点的统铺房间里，可以住七、八个人。他说照顾我们住安静一点的小房间，大房间人多闹杂，无法休息。床是一排长长的统铺，上面摆放着一排整齐的军用棉被。那天我和衣就睡，连大衣也没有脱。

第二天照常赶路，刘师傅告诉我们，今天

我们都要在海拔 4500 公尺以上的高地行走，晚上必须赶到温泉兵站住宿。这样第二天一早就可以翻过海拔最高的 5400 米的唐古拉山口，往后就不会这样难受了。还嘱咐我们实在顶不住了就少吸点氧气，尽量多留点准备过唐古拉山时用。

说起氧气，是西藏驻兰州办事处发给我们的，一人一袋。不知什么原因那位老同志没有带，他可能是年龄关系，一路上反映比我们大多了。我们害怕他过不了唐古拉，所以尽管我也有反映，但忍着不吸，留着给他吸，以防不测。

中午车到沱沱河，我和老同志都不行了。高原反映的感觉有似煤气中毒，头痛极了，这位老同志难受得已忍不住了，脸色极难看，于是开始给他吸点氧气，缓和缓和。这天中午我们二人没有吃饭。老程情况还可以，只是在下车走路时脚上无力，心里有点慌。

饭后继续赶路，从不断加重的高山反映中，

我意识到海拔越来越高了。天气也开始变幻莫测，车窗外一忽儿狂风呼啸，乌云压顶，一会儿豆大的冰雹打得车窗噼噼啪啪的响。有时又突然大雪纷飞，风雪过后，却又是阳光满地，晴空万里，这样变化无常的天气，也给我们增加了不少心理压力。刘师傅看我们对这样的天气茫然好奇，便告诉我们，高原气候的特点，就是早晚温差大，高原紫外线强，同在一地，有阳光的地方热得要脱衣服，无阳光的地方得穿上大衣还觉得冷，温度相差很远。在牧区这种变化无常的天气是常见的，所以牧民们穿的用老羊皮做的又宽又长的老羊皮长袍，腰间束条带子，当冷的时候，穿裹得好好的，大太阳出来热了，就把一只膀子伸出来，或上身全露裸着，这是对付这种忽冷忽热天气的，牧区的男女牧民都是这样的穿着。

车子越走越高，高山反映也越加厉害。我和老同志都有承受不了的感觉了。我们恳求刘师傅停下来休息一下。这次刘师傅的回答是斩

钉截铁的，他说：“不能停，也不能下车。在这样高的地方停车，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增加危险。”

傍晚到了温泉站，这里住宿吃饭的条件比五道梁好，洗用的热水也多了，果然吃饭也觉得有点味道了。我的头痛依旧厉害，但能忍得住了。

刘师傅叫我们晚上好好休息，明天天不亮就出发，上午要翻过 5000 多公尺的唐古拉山口，赶到安多站吃午饭。他要我们不要紧张，说唐古拉山只是海拔高，并没有什么险山峻岭，忍一忍就过去了。还告诉一个使我们听了都很兴奋的情况，说唐古拉山口是青海与西藏的交界线，翻过它就进入西藏地界了，你们也算已经到西藏了。

那晚我们睡的还好，人也舒服了些，一早五点就出发了。由于凌晨天气很冷，加之气候变化无常，翻越唐古拉山口时，高山缺氧反映更加厉害了。老同志虽然吸着氧气和我一样都

坐不住了。在刘师傅指点帮助下，把行李打开铺在后车厢中间地上，老同志和我只得躺在车子里。我一直没有吸氧气，一袋氧气已经被老同志吸完，看他的神色仍不太好，刘师傅说，把那一袋氧气也给他慢慢吸吧，能翻过唐古拉到安多站就不怕了。那里的地势要低一些，离今晚住地黑河也不远了，那里有医院可以吸氧气。

那天下午三点多钟，总算熬到了黑河。刘师傅很熟悉地把车子直接开到黑河军分区的帐篷医院。刘师傅与医院的同志简单的说了几句，就有医务人员来扶着老同志和我到病房躺下。医生用大氧气瓶给我们输氧，还给我们吃了药。那时的军分区还没有正规医院。当我躺在4500公尺高的部队帐篷医院的病床上，第一个感觉就是从未有过的安全感，也深深体会到这里的军民渔水情谊是多么的深厚。后来我们知道，像这样高原缺氧的病人，如果抢救不及时，往往会有生命危险。那晚我俩吸了一夜

氧气，人慢慢恢复过来，精神好多了，但还不能走动。清晨，老同志主动告诉我，这一路上，他不仅头痛，心脏也很不舒服，有时感到气都像接不上了。他说：“真谢谢刘师傅和你们一路上对我的照顾，假如没有这两袋氧气救急，说不定我会过不了唐古拉山的。”

黑河离拉萨只有三百余公里，是我们长途跋涉进藏的最后一天路程。

拉萨的海拔 3700 公尺。我们车一直往南开，路过当雄站后，我不仅觉察海拔越来越低了，而且路旁的景色也逐渐起了明显的变化。已能看到成片的青稞地和零星树木，时而也能遇到赶牲口的藏族同胞。还能望见石垒的藏族民房，和飘扬在房顶的五颜六色的经幡。这些情景，都是向我们预示目的地快到了。大约下午五、六点钟，刘师傅兴奋的告诉我们，前面就是拉萨西郊的堆龙德庆县，很快就要到拉萨了。我们听了顿时精神抖擞，仰头注视前方，唯恐看不见拉萨的出现。不一会儿，几乎在同时，我

们看到气势雄伟、巍峨矗立的布拉达官。她在金色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好像在迎接我们远来的客人。

车子从布达拉宫脚下绕过，穿过当时还不太繁华的街道，在一座藏式楼房院内停下。这是西藏工委招待所。刘师傅把我们安顿好住下后，对象们说：“我回工委先向组织部报告一下，你们好好休息，身体适应后再去报到。”没容我们道谢，刘师傅说声再见，就走了。

从格尔木到拉萨，整整走了四天。

到组织部报到后，我去工委宣传部上班，老程分在自治区妇联，老同志到西藏地质局。

从此，开始了西藏的新生活。

第四篇 援藏 20 年

(1960—1980 年)

- 一、去阿里专区慰问
- 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 三、强调长期建藏 学习藏语文
- 四、抓毛主席著作学习
- 五、文化大革命
- 六、调西藏自治区党校
- 七、调中央党校学习
- 八、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敬爱的小平同志

一、去阿里专区慰问

到西藏后，我的第一个任务是以西藏自治区党委的名义去西藏最西部的一个专区，也是我们祖国最西部的阿里专区慰问。因平叛后自治区党委还没有抽出时间去慰问过。慰问组组长是我们南通市委副书记刚调到西藏任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的曹旭，我是副组长。公安厅、粮食厅、贸易公司抽调一些骨干，一行 13 人，带着解放军的一个汽车连，15 辆解放牌卡车，满载着大米、白面和藏族生活必需的砖茶、百货等。1961 年 10 月 2 日从拉萨浩浩荡荡出发了。

拉萨至阿里分工委所在地 1800 公里。沿途多数路段不是正规公路，没有管理公路的“道班”，也没有部队设立的“兵站”（食宿点），必须自带粮食、干粮和食宿用具，吃住都在军车上。还要备带防御武器，以防叛匪袭击。完全是野战军的生活。

我们从南线，沿着尼泊尔边境一边进发。这次慰问使我体会到西藏的特殊地理环境、祖国山河的辽阔壮丽，高山、河流、湖泊错落有序，冈底斯山流出的马泉河、狮泉河、象泉河、孔雀河，终年流淌，滋润着这块美丽的土地。我们一早开着汽车出发，从日出到太阳落山，几乎很少看到一个村庄，也很少见到人群。沿途所见所闻，深深感到藏民族的勤劳勇敢，他们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生生不息地耕耘着、守卫着。我们也看到少数汉族援藏干部，在这艰苦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着，真是了不起。

险遭叛匪伏击。我们进入仲巴县，县委告诉我们明天你们要过“牛库”大草原，那里海拔4500米，有一条你们必经的险路，那里曾有过边境叛匪伏击车辆事件。果真那天我们经过时，天还没明亮，发现前方有手电筒晃动，显然是敌人活动。前面指挥车发出警告：有敌情，后面车辆紧紧跟上，打开全部车灯，作好

战斗准备。我们慰问组也荷枪实弹。15 辆车子，30 个车头灯，犹如 30 盏探照灯，巨大的光束摇摇晃晃，敌人弄不清我们有多少车辆，也弄不清是什么车子，没有敢动手，我们顺利过去了。

中午我们到了扎东部队所在地，他们告诉我们，上午 9 时“牛库”有一辆解放军放电影的中吉普遭叛匪仗击。叛匪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射击掩体，用机枪和步枪的火力压住车，9 名战士全部牺牲，电影机、电影片、枪枝全部被击，车辆被烧毁。这个被伏击的地点，正是我们发现敌情的地点。

从日喀则地区去阿里的唯一通道口，是冈底斯山一个叫马攸木拉山口。海拔 5000 米以上，几乎终年积雪。我们按地图进入山口前进，因为积雪爬行，爬了大半天，好不容易爬上了山口平台。可平台上白茫茫的一片，根本找不到出去的山口。15 辆车子犹如失去方向的蛟龙，在山口的平坝上乱转，有的车不注意陷进了凹

函，还要组织拖车。进没有方向，退没有退路，只好在雪地里宿营过夜，等待前方来车。

第一天过去了，雪还是下个不停。第二天雪停了，我们分析可能有车会来了。果然，第三天一早部队来车了，部队车子热情的把我们带出了山口，告诉我们往前的第一天你们住普兰县的一个区所在地，叫巴嘎；第二天住门土，也是普兰县的一个区所在地。那里距目的地阿里分区所在地噶尔昆萨只有一天路程了。

从门土出发那天，我们大家都起得很早，也很兴奋。1800 公里的路程，车队整整走了二十天。

到了分工委，慰问组受了党政军各级干部和藏汉族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见到慰问组的同志，比见到亲人还亲切。第二天分工委和军分区召开欢迎大会，曹旭代表自治区党委作了慰问报告，寺庙上层人士也请我们吃饭，表示欢迎。

专区慰问完后，曹旭同志因调任那曲地委

书记，他先回拉萨去了。剩下的同志根据自治区党委指示，分成两个小组，分别深入农区和牧区以及边境去看望慰问农牧民群众。我带领的组到以牧业为主的祖国最西部的边境县日土县。

日土县面积 7.5 万平方公里，人口 5000，平均每 15 平方公里才有 1 个人。该县边境线长，境外叛匪谣言惑众，使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听信谣言，跑到边境地区徘徊不归。争取这部分群众回归，是该县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工作组在日土县委领导下，深入附近的日土乡，自带粮食，同群众住在一起，走门串户，宣传群众，做影响群众的工作，利用放露天电影等一切机会，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宣传祖国的强大，使群众不再听信境外谣言。对在边境徘徊的群众，讲明党的政策，力劝他们回归。对乡里特别困难的群众，则送些粮食、砖茶和盐巴，使他们能够安全渡过冬天。

经过两个月的工作，群众情绪安定，外逃

群众也陆续回归。

我们在生产、办学上也为群众做了不少好事。

慰问进行6个月，于1962年6月，从北线穿过羌塘无人区。在无人区里，成群的藏羚羊，远远的遥望着我们的车队，胆大的野驴，甚至同我们车子并着奔跑。

经过无人区，进入申扎、那曲、当宏等牧区县回到拉萨，路上经历11天。

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回到拉萨，1962年10月20日，印度边防部队向我边境边防部队发起全面武装进攻，我西藏、新疆边防部队，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在不得已形势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狠狠地打击进入的敌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西藏各部门全力投入这一战斗。全区干部职工停止正常休假，立即回到工作岗位，一、防空袭；二、做好自卫准备；三、严防不法分子趁机捣

乱。我们宣传部的主要任务是编印资料，宣传中印边境问题真相，揭露印度反动政府阴谋，宣传我们的正确主张。

11月21日毛主席为了促成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决定11月22日零时起主动停火，并于12月1日开始，主动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内侧20公里地区。

至此，自卫反击战取得了完全胜利。

三、树立长期建藏思想 强调学习藏语文

1980年以前的调藏干部，没有轮换制的说法，也没有工作几年可以回内地的说法。为了进藏干部进藏后安心在藏工作，所以必须强调树立“长期建藏”思想，甚至要有“死在西藏”“埋在西藏”的思想准备。

我们宣传部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进藏的汉族干部学习藏语藏文。我曾组织一个班子编写了上、中、下，即一、二、三册藏语文读本，供全区干部职工学习。

四、抓毛主席著作学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公开发行。为立即掀起学习高潮，在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再旺的直接领导下，以我处为基础，在自治区机关抽调一些专职理论干部，成立毛泽东著作学习办公室，统一抓全区的学习活动。我们的任务是总结学习经验，发现典型，组织交流，召开经验交流会形式，推动学习进一步深入，并从中发现优秀苗子、培养藏族各级领导干部。那时确实涌现了一批学用结合的藏族优秀干部。如曾经是农奴后成为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的热地、从奴隶成长为西藏第一个女副县长、后来成为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巴桑，都是当时的杰出代表。

五、文化大革命

西藏与全国各地一样，也开展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揪斗“走资派”。但是西藏是民族、

边疆地区，明确县以下（含县）不搞文化大革命。随着运动的深入，自治区机关职工也分成两派，互相揪斗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也呈瘫痪状态。我因为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工作，中宣部首先受到冲击后，下面的宣传部门也不例外，我们这些处以上干部都成了“牛鬼蛇神”、“反党分子”被批斗。平时除了批斗，就是勒令“劳动种菜”（因西藏机关职工的吃菜主要靠自己种）。

群众组织间发生武斗后，军管单位西藏军区，为防止乱揪乱斗，造成社会混乱，决定把直属机关和地市委的主要领导干部集中在部队营房管理。我是被集中在拉萨近郊的一个师部，在一间大房子的水泥地上铺上木板，我们（包括地市委书记、直属机关厅长）都编成小组，排着睡在地铺上，学习、生活都在自己的铺位上，集体学习毛泽东著作。

1969年11月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

决定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集中到地势比较低的林芝地区八一疗养院进行“斗批改”学习。林芝距拉萨 400 公里，海拔 3400 公尺，我和程明敏都参加了。

1970 年冬，学习结束，允许我与程明敏回内地休假探亲。这次休假是我进藏 10 年后第一次休假，曾得到当时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天宝（藏族）在大会上的口头表扬。

六、调西藏自治区党校

1971 年冬，西藏文化大革命基本结束。1972 年初调我去波密县的易贡，筹备自治区党校复校工作，程明敏一起调往。易贡是西藏林芝原始森林地区的一个大山沟，海拔 2200 公尺、气候宜人。那里是中央号召“三线建设”时为自治区党政机关修建的一大片办公楼和宿舍群，距拉萨 600 公里。在那里复校，主要是考虑在藏汉族干部可以在地势低点的地方，一面学习，一面休养。同时那里学员所需烧柴、

— 62 —

蔬菜、养猪自己动手，都好解决。

西藏干部在机关都有自己种菜自己吃的习惯，开学前组织学员劳动3天，不仅没有阻力，而且很高兴。一部分学员上山砍伐松树，锯成一段一段，拉回学校劈成烧柴，学期两个月就要供两个月烧水、煮饭够用；另一部分学员在蔬菜地里种植各种蔬菜，再请附近部队供应一点，吃菜就解决了。

我到党校先任教育长，1975年任副校长。

党校离区党委太远，确有诸多不便，80年后又搬回拉萨了。

七、调中央党校学习

1977年9月，粉碎“四人帮”后，已经停办多年的中央党校复校，我被调到中央党校理论部学习一年半。

复校后的中央党校第一期招收学员800名。分三个部：一部是省部级干部；二部是厅局级干部；三部是宣传理论干部。三部的学员来自

各省市委宣传部、省市委党校、报社，国家机关和部队搞政治理论宣传工作的干部。分四个支部，我是第二支部书记。

开始，以将近一年的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学说四门课程。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配以讲课辅导。要求认真阅读原著，掌握原著的精神实质，理论联系实际，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一年后，分四个专业，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我选的是“党的建设”专业。

中央党校靠北京颐和园，风景秀丽，校园宽广，环境幽静，是读书绝好地方。一个人一个房间，生活设施和后勤供应都很好。我从条件差的西藏调到这样好的地方学习，而且是一年半时间，满足极了，暗暗给自己下了决心，一定要抓住这个绝好机会，多读些书，多增长些知识。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确是认真读了一些

马列主义原著。规定学习的原著我都认真读了，没有规定的我也读了一些，可惜我的基础太差，很多读不懂。

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半的时间里，听了不少中央领导和学术界专家的联系实际的报告和讲课，帮助我们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学期结束前，我们正遇上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出山，主持中央工作。小平同志主持了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说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摒弃使用“阶级斗争为纲”，作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重要决策。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从此，全党全国人民进入了新的改革开放历史时期。

学期结束，学员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个个精神抖擞，拥抱硕果，回到了工作岗位。



八、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敬爱的小平同志

我四次见到敬爱的小平同志。

第一次是 1949 年 9 月 6 日，小平同志在南京原国民大会堂（现在的人民大会堂），向西南服务团战士作学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辅导报告。

第二次是 1949 年 9 月 21 日，在现在的东南大学原中央大学大操场，作《论老实》报告。

第三次、第四次是党和国家的建设时期。

1977 年，中央党校在“文革”期间停办后复校的第一期开学，我被派往中央党校学习，有幸第三次见到敬爱的邓小平同志。

1977 年 10 月 9 日下午，中央党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全校 800 名学员和复校后的全体工作人员，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大礼堂门前的大操场上，等待着中央领导的接见。下午 3 时正，中央领导来了，华国锋主席走在前面，叶剑英副主席和邓小平副主席两人肩并肩、拍着手，慈祥友善。后面是李先念、陈云等其他领导人。我们看到领导人进场，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

我前面两次见到小平同志时他 45 岁，正是风华正茂、转战南北，战功赫赫。1977 年，已经 73 岁了，看上去是老了点，但走路稳健，体态饱满，和蔼可亲，精神如同往年。他有节

奏的鼓掌，向我们招手，显示出他的信心和毅力。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重振朝纲的重任又将落到小平同志身上。

第四次是 1979 年 3 月，中央召开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当时我在西藏自治区党校任副校长，自治区党委指定我去参加。在这个会上又有幸见到小平同志，并聆听了他在务虚会上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

理论务虚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为使理论宣传工作更好的适应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中央召开了这次会议。

报告针对性非常强，分析深刻透彻，意义深远。与会同志来时带了很多要求解答的问题，听了报告后，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了，所带问题好像小平同志都回答了。

这次会议共开十天。对理论宣传战线的同志鼓舞很大。认识提高了，信心增强了，干劲

更足了。

我四次见到小平同志，跨越了两个历史阶段，经历两代领导伟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邓小平是重要核心成员。战争年代，他转战南北，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赫赫战功，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提出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倡议和推动兴办经济特区，逐步形成全面开放格局。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视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他要求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精

神文明建设。他提出的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他创造性地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一贯重视党的建设，是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他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并以身力行。他不愧是我们党和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我刚参加工作，就受小平同志亲自教诲，50多年的工作实践，我深深体会到：没有邓小平，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没有邓小平，也不可能今天的中国人民的新生活。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不愧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就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永远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